



观察家丛书第1辑

公共知识分子的声音

许知远 / 主编

转型时代



4-53
8



机械工业出版社
China Machine Pres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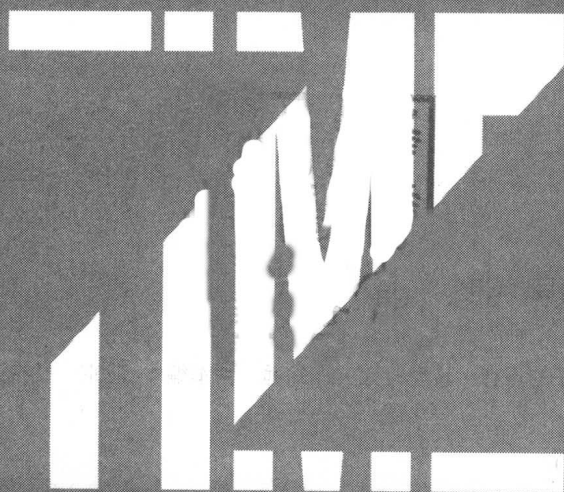
观察家丛书第1辑

公共知识分子的声音

许知远 / 主编

F114-53
X718

转型时代



机械工业出版社
China Machine Press

H11087/2

本书收录的是《经济观察报》观察家版组的专题报道与访谈文章，我们不仅关注中国的变化和前途，更关注世界的变化和中国与世界的互动；本书不仅直面当下中国和世界面临的各种困境和问题，更试图以理性、冷静和积极的态度通过传播先进的思想和理念为解决这些困境和问题提供建议与参考。

本书由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不是以任何方式抄袭、复制或节录本书中的任何部分。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公共知识分子的声音·转型时代 / 许知远，何军编.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3.1

（观察家丛书）

ISBN 7-111-11360-8

I. 公… II. ①许… ②何… III. 国际经济关系—研究—文集 IV. D11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2）第099316号

机械工业出版社（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2号 邮政编码 100037）

责任编辑：李玲 版式设计：赵俊斌

山东高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2003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787mm×1092mm 1/16·14印张

定价：25.00元

凡购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本社发行部调换

总 序

重建公共知识分子传统

许知远

“(他们是)倒卖观念的职业好手”，哈耶克是20世纪最有力的公共知识分子的抨击者之一，尽管他在后半生成为该行列中最著名的一员。记者、教师与媒体代表，这些经典的公共知识分子类型，在顽固的哈耶克眼中，就是那些“在有了些道听途说的科学知识以后，便自封为现代思想的代表……肩负着向公众提供新观念责任的人。”在战后那场席卷世界的集体主义潮流中，势单力薄的哈耶克发现这些一知半解的公共知识分子占据着舆论的中心，做出煞有介事却漏洞百出的判断，在整个20世纪三四十年代那么多杰出的知识分子醉心于斯大林的改革与凯恩斯的方案。

在这种意义上，理查德·波斯纳，美国杰出的联邦法官、芝加哥大学法学教授、不可置信的高产作家是哈耶克的继承者。在2002年出版的《公共知识分子》一书中，他继续鄙夷这些倒卖观念的职业好手。他坚持，专家不应该超越自己的专业发表言论，而那些依靠媒体与出版业生存的所谓知识分子则沦为市场的奴隶，他们的工作质量不敢恭维。他举例说，那些广泛谈论微软反垄断案的“媒体权威(pundit)”其实根本不了解关键问题所在；同样的，广受欢迎的生物学家斯蒂芬·杰·古尔德在写作科普读物时也不该涉及人工智能问题，因为他并不了解……总之，受人尊敬的专家兼公众知识分子理查德·波斯纳，除了饶有兴致的为最受媒体与观众欢迎的公众知识分子列出排行榜外（亨利·基辛格名列第一），还提出了这样的警告：不要自作聪明，对超出专业范围的议题发言。“很不幸，波斯纳同样没办法证明他是知识分子问题的权威”，拉塞尔·雅克比在《洛杉矶时报书评》上

反唇相讥道。

在1987年出版的著作《最后的知识分子》中，拉塞尔·雅克比表达了对美国知识界的更深的忧虑，即真正的危机是知识分子这一群体正在消失，它被专业化程度过高、狭隘的学院专家们取代。雅克比心目中最后一代知识分子是20世纪50年代以丹尼尔·贝尔、加尔布雷斯、特里林为代表的纽约文人圈，他们用优雅、清晰的笔调关注广阔的问题，致力于为有教养的人群写作，而如今的专家们的意见只有少数的同行可以理解。判断知识分子的标准何在，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人比法国人班达的定义更具感染力：“他们的本质不是追求实用的目的，而是在艺术、科学或形而上的思索中寻求乐趣，简言之，就是寻求拥有非物质方面的利益，因此也在用某种方式说，‘我的国度不属于这个世界’。”在这个定义之中，所谓公众知识分子或是学院分子，记者还是大学教授这样的角色定义失去了意义。

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丹尼尔·贝尔这样描述现代文化的特性——宫廷乐师、行吟诗人与修道院的僧侣如今变成广告撰稿人、专栏作家与公共形象设计者。被长期拘禁在牢狱中的意大利人安东尼奥·葛兰西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他以更开放的心态扩大了知识分子的范畴，除了传统的知识分子，葛兰西创造了“有机知识分子”这一名词，它意指伴随商业社会而生的人员，他们可能是工业技术人员、政治经济专家、律师，他们的工作更多的是运用智力而非体力，葛兰西在20世纪30年代的判断在今天显得更为准确。彼得·德鲁克称我们正在进入一个知识型社会，伴随着官僚体制的崩溃，人们越来越从刻板的工作中解脱出来，他们有了更多的自由，而新型的工作也需要更多的激情、创意。刚刚过去的dot-com风潮似乎正暗示了这股新潮流，彼得·圣吉所说的“学习型组织”风靡全球，学习变成了不倦的、终身性的工作。20世纪60年代的西方青年喜欢说“人人都是艺术家”，我们今天是否可以说“人人都是知识分子”。

爱德华·萨义德在BBC电台的里斯讲座上讲道，纯属个人或纯属公众的知识分子都不存在，只要你用文字表达，就意味着进入公众视野。兴趣广泛而优雅的萨义德得出了自由的知识分子定义：“知识分子是以代表艺术为业的个人，不管那是演说、写作、教学或上电视。”约瑟夫·康拉德将文学创作比做黑暗中的救援工作，作家将人们由无意识的黑暗状态中拯救出来。而在班达、雅克比与萨义德心

目中，知识分子则一直在打破日常生活的平庸与乏味，他们的武器是强烈的好奇心，而敌人则是一切循规蹈矩与面目可憎的重复，他们力图赋予暗淡的现实生活以意义。

让我们回到哈耶克与波斯纳的嘲讽，我承认他们的批评都有道理，他们厌恶的是那些未经思考便盲从既有观念的应声筒。但是，他们的偏激（尤其是波斯纳）妨碍了他们看到更深的危机，知识分子的真正陷阱是沦入过度专业化与技术化的陷阱，失去了对更广阔世界的好奇心，他们不是过度传播新观念，而是对新观念浑然不觉。况且，我们不应该要求每一位活跃思考的知识分子都做出正确的判断，他们最重要的职责是保持不停的思考。

当这场争论跳跃到中国的语境时，我们则面临更加复杂的状况。长期以来，我们将知识分子的角色混同于各种类型的技术专家、工程师、医生，或是社会学教授，只要他们具有专业知识、受过大学教育，他们就是知识分子。但同时我也要承认，将知识分子这一角色过于理想化同样是个错误，一些中国学者顽固地将之塑造成类似索尔仁尼琴那样的异议分子，他们只强调知识分子批判性的一面，却忽略了批判本身并非目的。而当为了批判而批判时，批判本身就成了一种机械的重复，它失去了知识分子最珍贵的思考与创造精神。

作为在20世纪90年代成长并成熟起来的中国青年来说，他们经历了一个知识分子气质极度匮乏的年代。我们是怎样度过大学时代的——那些陈旧的教材和日复一日被转述的陈腐的知识。我甚至可以不无粗暴地说，90%以上的中国大学生其实从未接触过真正意义上的教育，我们被教会背诵、服从、考试，而缺乏奇思异想的能力。更多的知识匠人代替了知识分子，他们无力对变化的外部世界做出反应。在转型期必然出现的价值混乱中，我们听不到他们清晰有力的声音。

“大学不再像过去那样受人青睐。”伦敦经济学院院长安东尼·吉登斯说，大学不再是知识生产的惟一中心，它拥有越来越多的竞争对手，它们是思想库、研究代理商、调查代理商、管理咨询公司和媒体公司等等。而在令拉塞尔·雅克比憧憬不已的美国的知识分子的黄金年代中，很多杰出知识分子是为《时代》、《新共和》这样的杂志工作，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认为学院工作会束缚他们的创造力。而在中国，更尴尬的是，当我们的大学仍未拥有（或恢复）它的知识中心的地位

时，类似思想库、媒体这样的竞争对手也未成熟。思维上的普遍混乱与平庸状态，不断提醒人们，整个社会是多么需要知识分子与他们所代表的气质。或许，在20世纪80年代，我们还拥有李泽厚、刘再复，拥有“走向未来丛书”，鼓舞了社会最活跃的阶层更广泛地参与知识或公共事物讨论。

“《时代》对于美国教育的作用大于美国所有教育系统的总和。”芝加哥大学校长罗伯特·赫钦斯对于亨利·卢梭所创办的杂志的影响力的评价，鼓舞了《经济观察报》的成长与这套《观察家丛书》的出版。我们目睹着中国在过去10年间的高速变化，伴随着各种新观念与名词出现的是深刻的文化断裂感，尽管一个在更广阔的知识背景哺育下的群体正在形成，但对外部世界的无知在中国社会同样显著。

《经济观察报》从未将自己人为限制成“一张领导性的商业报纸”，在转型时代，它可能拥有更宽广的胸怀与更富雄心的抱负。我们尊敬专业型媒体，却相信，我们可以做出一些影响更为深远的举动。在将近两年的短暂历史中，我们力图鼓舞鲜活的新知识分子精神的成长，我们将注意力广泛地投注于每一个富于智力性的话题，我们想了解9·11之后世界发生了哪些变化、转型经济学的特别之处、美国如何建立新的霸权、新闻传统发生了哪些变化、科家们如何看待量子计算机的未来、政治领导人重建世界新秩序的努力、富人应在转型中国扮演什么角色、一家生气勃勃的公司为何会突然“死亡”、文学与艺术是否一直在堕落……我们希望这些探讨建立在对专业知识更为深入了解的基础上，但我们更期待通过这种广泛的讨论来建立起一个供更多的读者思考与参与的平台。我们从不奢望我们的判断一定正确，也不是为所有人而服务的，我们甚至不期待它带来更多的实用色彩，比如教会你怎么炒股票和创办一家公司。我们希望我们与一个有教养的阶层共同成长，这一群体可能是商人、公司管理人员、政府官员、学生、教授或是一个工人，他们知道是好奇心与力图与众不同的热情在驱动这个世界，他们像躲避灾难一样躲避平庸，他们都是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在这个知识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更替的时代，这一点使他们避免沦为僵化分子。

这套丛书的第一辑分为四本，其中《评论中国》和《后9·11世界》是2002年《经济观察报》专栏文章的精选，我们希望这些评论能够激发起你对历史的热忱，

体验到回顾纷繁的历史变迁的乐趣；《转型时代》是“观察家”栏目的集合，它从某个侧面体现了转型中国正在进行的观念变革；《观念的冒险》是在“全球视角”栏目下进行的对世界杰出人物的访谈。我们试图从他们那里了解到，这个世界到底发生着什么变化，我们该如何应对各种挑战。这四本书（包括这篇序言），都带有明显的令哈耶克唾弃的“在有了些道听途说的科学知识以后，便自封为现代思想的代表……肩负着向公众提供新观念责任的人”的气质。不过，比这种轻蔑更重要的是，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中国自由讨论的气氛。我不喜欢公共知识分子这个名词，因为就像我前面得出的结论，只有低级知识分子（知识匠人）与高级知识分子的区别，而没有个体知识分子与公众知识分子的差异。我们也没有试图为我们的角色赋予更崇高的意义，我得承认，有一类人天生就喜欢讨论各种没用的概念，我也承认这种人像任何人一样有对金钱与名声的渴望，即使伟大如埃德蒙·威尔逊也会这样评价他的一位过于单纯的朋友：“他绝不会理解写作也是一件商品，和其他商品一样，如果没有赞助，这商品就得以火爆炒作的方式出售。”我们同样要承认，即使我将《经济观察报》的抱负推向了它并不匹配的地位，我也同意人们通常对新闻业的评价“它天生追逐权力、金钱与戏剧”。但比起这一切弱点，我们最为看中的一点仍是，我们是否鼓舞起你对世界的广泛的兴趣？

经济观察报

The Economic Observer



观察家丛书第1辑

公共知识分子的声音

许知远/主编



经济观察报

The Economic Observer



观察家丛书第1辑

公共知识分子的声音

许知远/主编

《转型时代》

本书收录的是《经济观察报》“全球视角”栏目的精选内容，“全球视角”聚焦于世界各国政界、商界、学界和文化界的知名人物，通过深入而独特的人物专访，为读者提供观看世界的新视角。

我们向当今世界最杰出的人们提出一些基本问题：如何理解这个迅速变化的世界？如何定义我们在历史中的地位？个人和商业组织间是什么关系？商业在今日世界发展中的作用是什么？今日亚洲的世界地位是什么？作为一个彼此完全不同的众多国家的组合，以及作为整个世界的一个奇异组成部分，亚洲能够达到怎样的地位？

执行编辑：何 军

公共知识分子的声音·转型时代

目 录

总序 重建公共知识分子传统

中国报道

除了杰克·韦尔奇，你还有别的榜样	3
媒体监督的荆棘路	12
立法能否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	18
(附录：上海银行支持中小企业的实践)	22
中国MBA教育——混乱中前行	25
从联想分拆看中国企业管理官僚成本的无奈	30
中国为什么没有期权制度	33
中国反洗钱	39
医疗保障的前途	43
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战略选择	46
南京爱立信“倒戈”的另类思考	55
中国的蓝领之梦	60
超出预期的增长	67
物权法——护佑财富中国	75
从全能到有限：《行政许可法》再造政府	82

观察家视野

中国，从静止到流动	91
(附录：背景材料)	109
政府改革的道路	110
政府采购——阳光下的交易	120

土地制度的第二次创新	126
人口问题的另一种思考	134
让民间资本平等进入	143
合并, 就是做跨国银行	149
(附录: 世界主要银行兼并案)	156
驾驭脆弱的世界	158
(附录: 樊纲提交给2002年世界经济论坛年会的议题)	164

2002年的中国和世界

中国与日本: 并非零和竞争	167
中美: 在合作中寻求安全	175
中印软件业: 虚拟的战争	178
互动的东亚经济一体化	186
拉美危机给中国的警示	190
欧洲向右转?	196
(附录: 有关国家主要极右翼政党概况)	200
大公司为什么会死亡	202

中国报道

除了杰克·韦尔奇，你还有别的榜样

文/许知远

2002年春节前夕，中央电视台《对话》栏目以“影响未来若干年发展的最有价值的理念”为主题，在全球范围内对124位参与过《对话》节目的全部嘉宾进行了问卷调查。近100位调查对象回答了问卷。《经济观察报》独家获得了此次调查结果，并以我们的视角对其进行了诠释。

如何成为一名伟大的企业领袖？哈佛商学院教授理查得·泰德罗在经过多年研究之后得出了一个令人沮丧的结论：他们生为领袖，而非后天造就；他们创造哈佛商学院案例，而非学习案例。当然，你不用过于悲伤，因为在泰德罗教授心目中，惟有亨利·福特、托马斯·沃森、安德鲁·卡内基之流才称得上伟大，因为他们塑造了现代商业的模式。至于在过去20年里风行一时的杰克·韦尔奇，泰德罗显然认定他尚未有资格获得历史地位。

这或多或少会让中国的新一代企业家们略感不安。在中央电视台的《对话》节目于2002年初进行的嘉宾问卷调查中，26位嘉宾在“正在读的书”一栏中填上了《杰克·韦尔奇自传》，他们中既有老牌的刘永行、柳传志，也有新生代的王树彤、于干。

除了少数学者与政府官员外，企业家是《对话》栏目几近不变的嘉宾。当然，出于对新闻事件与个人魅力的强调，这份名单不可能精确地反映出中国工商界的真实情况。一方面，它不得不遗漏一些同样举足轻重的企业的负责人（包括中国石化、宝钢等），另一方面它又过于钟情dot-commer（不厌其烦地就新浪、8848、搜狐这样缺乏实质影响力的公司进行讨论）。当然，我们要承认，这份调查依旧是中国范围内最好的调查之一，因为《对话》栏目至少比较准确地把握住了今日中国经济最为活跃的部分，他们或许缺乏创造力地不断谈及柳传志、王石、吴士宏、张朝阳乃至张继升，但在依旧十分贫瘠的中国商业领域内，他们的是惟一听到的声音。

行进中的中国商业和商人

对于企业家的过分迷恋已经成为新潮流，作为中国改革进程中最果断的部分，工商领域的确给个人才智以更大的挥舞空间。在多年的物质匮乏之后，中国人对于财富产生了罕见的饥渴感，人们对于创造财富的人充满羡慕与嫉妒。在工人、老大哥、解放军、大学生、娱乐明星之后，企业家成为了新的风尚代言人。你不得不承认，张朝阳、王志东们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拥有的影响力，与朦胧诗人在80年代的号召力颇为类似。

在从未有过企业家传统的中国，柳传志、刘永行至多能将自己的传统上延至胡雪岩。我们或许有过徽商与山西的银票，却从没见过不受政府干预的市场机制。我们的近代企业机制是在半殖民地背景下向外人学来的，这些企业主就是作家茅盾笔下的“民族资本家”，法国汉学家白吉乐所说的“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1911~1937年）很快被抗日战争与内战所终结。紧接着，企业的经营者变成了中国社会最值得唾弃的群体之一（甚至不如知识分子）。

直到改革开放后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投机倒把”依旧是一项罪名，但是企业理论开创者之一的法国经济学家J·B·萨伊对企业家的定义即是“将经济资源从生产力和产出较低的地方转移到较高的领域”。没人能预料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中国发生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变化，商业行为奇迹般地登上了历史的舞台（由于过于突然，它不由自主地带上了暴发户式的铜臭味），企业家被赋予了他们自己尚无法驾驭的声誉与意义。在政治与文化这两条线索基本没有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企业家所进行的商业活动触动了社会的敏感神经。你可以理解一位叫吴士宏的高级管理人员如何突然间成为街谈巷议的话题？或是倪润峰在彩电降价上缺乏想像力的举措如何一次次地成为媒体关注的中心……

传统与创新、全球化与民族情感，这两类困扰着所有国家的冲突，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将相当部分的力量转嫁到了中国企业家的身上（这两类冲突在中国又尤其强烈）。他们一方面要在一片荒原上创造出自己的商业传统，另一方面他们又没有足够的时间与机会进行尝试，政策上的限制与这个社会对于失败的鄙视都令

他们的探索谨小慎微。从进入股票市场到对产权制度的要求，他们的成果与挫折表露着中国改革进程的加速与放缓。他们刚刚准备从外部世界寻找经验，却发现这些叫IBM、惠普与杰克·韦尔奇的老师们迅速加入了竞争者的队伍，况且那些拯救克莱斯勒、缔造松下的经验似乎也不那么适合“挽救巨人”……同样的，这些最初由于勇敢或侥幸而成功的企业家，并未全部因为财富的增长或是地位的提
高而获得相应的能力，很多人依旧被自己天然的缺陷所左右——眼光狭隘、农民作风、任人唯亲、不求上进、缺乏诚信。90年代中国商业界上演的闹剧，从点子大王到牟其中再到三株口服液的兴衰，与欧·亨利笔下的20世纪初的美国闹剧世界异常相似。但是，没人否认一些更为严肃的商业精神正在这样的环境中生长起来，那些成熟国家的商业经验正在被迅速接受。一本叫《中国企业家》的杂志在1996年时依旧备受冷落，但到2002年初却已备受关注，它倾心的群体已经以相当整齐的阵容不仅凸显于中国社会，更成为中心话题。

于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这一里程碑式的协议还原成了一种经济行为，变成了由中国企业家群体领衔主演、对抗或拥抱跨国公司的进攻与诱惑的一出正剧，泪水与欢笑交织，结局可能还算美妙。2002年很容易被命名为“中国企业元年”，它标志着至少在经济意义上，中国已经融入全球化进程（它至少可以先成为世界工厂），中国企业家要在与老师们的竞争中学习与成长（你会在《对话》节目中看到，中国的CEO们多么渴望与伊梅尔特这样的世界级CEO交流）。

所以，《对话》栏目这份调查结果，多少暗示出在这个敏感时刻中国社会的整体形态，它以商业为例，却远远超越了商业范畴。对于历史感深重的中国人来说，未来10年的发展将深刻地影响中国历史进程。为张树新所推崇的黄仁宇（他的名字几乎像杰克·韦尔奇一样成了cliche）陈词滥调大历史观念的核心，即是如何以数字观念替代中国的传统，他将1985年定为一个分水岭，因为中国政府在这一年已经学会了如何用数字管理国家。忽略掉黄先生过于武断与一厢情愿的结论，有一点是清晰的，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在一片荒原上建立新世界的过程。在1978年之前的岁月里，中国人将自己的传统（除了教条的部分）完全“破四旧”；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摸着石头过河”，我们在荆棘之中茫然地探索；但是如今，我